

# 云南抗战时期的军事译员培训

李方华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DOI:10.12238/jief.v6i3.7883

**[摘要]** 抗战期间,为了抵御入侵缅甸的日军,保卫滇缅公路,中国组建了远征军与盟军共同作战。由于语言障碍,中国军队与盟军无法进行有效沟通,盟军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征调军事译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回顾了抗战早期的应对措施与不足,梳理了军事译员征调活动进程,重点分析并研究了军事译员的培训过程和内容,肯定了译员征调和培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发现了军事译员在战争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军事译员的培训教育对于当今军事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教育同样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军事译员; 译员培训; 军事翻译

中图分类号: E12 文献标识码: A

## A Study on the Training of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Yun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Fanghua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Expeditionary Force was organized to resist Japanese armies and defend the Yunnan-Burma Roa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from British and American Allied forces. However, American Allied force could not take their military advantages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 the requisition of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had to be settled urgently. The paper reviewed the earlier solutions and its limitations, outlined the process of military requisition, mainly analyzed and emphasized the military process and its focus, affirmed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military requisition, and concluded the indispensable role of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in the war. Meanwhile, the training of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ould be thought-provoking and referential to the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of contemporary military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alents.

**[Key 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military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raining; military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 引言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进逼缅甸。滇缅公路作为当时中国对外获取国际援助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岌岌可危。为了保卫滇缅公路,支援正在缅甸对日作战的英军,1942年中国组建了远征军入缅与盟军共同作战。

为了配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美军通过“租界法案”向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如新式武器、弹药、通讯和医疗等,并先后派出了“飞虎队”、工程兵部队等。为了保证盟军之间的有效沟通,中国远征军营以上的军事单位均设有美军联络员(Liaison Officer)。然而,由于当时远征军军官大多不懂英语,盟军将领和美军联络员也很少有人通晓汉语。若要充分发挥盟军军事优势,语言鸿沟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莫娜·贝克(Mona Baker)在《翻译与冲突:叙述性解释》中指出:翻译是

战争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翻译在控制各方面冲突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还影响了军事冲突的发展过程<sup>[1]</sup>。

### 1 抗战早期的应对措施

战争初期,美国战争部曾印制过《中文短语手册》(Chinese Phrase Book)和《广东话指南》(Cantonese Language Guide),但因编排过于简单、使用范围有限,且缺乏针对性,而未得到推广使用;之后,美国驻中缅印华军训练总处还编写了《英汉对照军语词典草编》(Dictionary of Common Military Terms English-Chinese),可词典远远不能满足战前训练、备战和战场上及时有效沟通的需要。

中国战地服务团(War Area Service Corps)也曾为中缅印战区的美国空军印制过《指头谈话》(Pointie Talkie)。若遭遇飞机坠落,美军飞行员便可指着左页的英语会话与中国当地

人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尽管后期版本又根据需要附加了一些图片,但由于当时云南当地多为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加之手册针对性较强,主要供空军人员使用,不能广泛运用于其他兵种。另外,手册本身篇幅有限,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不便,不能满足快速变化的战时需求。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应急交流工具和参考书籍,手册、指南和词典只能满足最基本的沟通交流,但却不能有效满足战时的军事活动需要,语言沟通任务还是要由军事译员来承担。由于军事译员的缺乏,美军只能住在招待所,无法开展工作;武器装备也只能堆积在仓库,派不上用场。时任翻译官的王士忠曾回忆说:

[民国]三三年春季,大量的美方教官及军火武器源源运到,然因为缺乏通译人员,美方教官无法教练,中国士兵也无法使用新式武器。我们只见美方官兵整日成群地在昆明的大街小巷游来游去,又无法工作,不只是浪费了国家金钱,而且会拖延抗战时间……<sup>[2]</sup>

可以想象,如果军事译员缺乏的情况长久持续下去,中国军队和盟军之间由于无法正常沟通,整训无法进行,士兵不会使用新式武器和装备,中国军队与盟军不能协同作战,那么中国军队能否战胜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就将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召集到足够多的军事译员,以满足中国军队和盟军军事联络的需求。于是,一场大规模大范围的军事译员征调活动便应运而生。

## 2 军事译员的征调活动

### 2.1 译员的征调措施

为了及时解决军事译员缺乏,尽快实现中国远征军和盟军之间的有效沟通,国民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周密部署和系统安排,军事译员征调活动涉及机构设置、法律规定和制度保障等方面。

1941年,美国志愿航空队抵达昆明,国民政府教育部随即就向全国发布通知,号召各大学外文系高年级男生服役一年。此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联合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多次发布号令、指示,进行译员征调。1944年国民政府补充修订了《军事委员会征调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充任译员办法》,该办法不仅明确规定了征调对象、工作时间和地点、译员培训等具体事项,还确定了征调目的、译员社会地位、经济报酬以及责任义务等。

1943年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公布了《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规定四年级男生在第一学期考试结束后,一律前往译训班接受培训。对应征学生以优待,如四年级学生“较规定毕业所需学分所差不逾32学分者,于服务期满后发给毕业证书,仍作为原毕业年度毕业”;“一二三年级学生支援应征服务者,于服务期满返校时,由各系酌定免修32学分”;“服务学生概予免修军训、体育”等。而对于符合征调条件的应届毕业生,“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sup>[3]</sup>。

此外,译员征调对象并不仅限于学生。1945年7月,国民政府下令四川省政府,在各机关团体和学校中征调100名擅长英语的20至40岁男性现职人员,赴外事局任盟军译员,并规定了若干优

遇办法,如保留原职原薪,外事局代为办理考核升迁事宜,服役表现优异者资送出国深造等。

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政府以及教育部门都非常重视军事译员的征调工作,一方面在社会地位、经济报酬等方面给予译员优厚待遇,另一方面征调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征调活动的有序有效开展。

### 2.2 译员的征调结果

根据战时需要,译员集中征调主要有“军委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简称“战地服务团译训班”)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简称“军委会译训班”)两次,其中,尤以后者征调数量居多。据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回忆:“总计抗战时期征调任译员之学生共三千二百七十一人。其在校学生自动参加军佐工作或译员工作者尚不在内……受征学员,都是踊跃应征,不避艰险,完成任务,没有一个临征而规避的”<sup>[4]</sup>。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昆明译员训练班只办了两期,共培养译员70余人,其中大半是西南联大学生<sup>[5]</sup>。另据云南省档案馆“西南联大档案”记载,军委会译训班共办9期,其中,西南联大共有437名学生参加了译员培训<sup>[6]</sup>。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的独子梅祖彦,本不在应征之列,却也应征做了翻译官。据许渊冲回忆,罗宗明本已在英国领事馆兼任英文秘书,待遇比军人优厚,但他毅然放弃高薪,投身抗日<sup>[7]</sup>。

除此之外,还有大学教师(西南联大的穆旦等)、政府机关职员、港籍人士(如来自香港的潘士敦)等均积极响应征调<sup>[8]</sup>。

## 3 军事译员的培训教育

国民政府极为重视译员培训工作,先后有蒋介石、陈诚、商震、何浩若等国民政府要员以及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Lt. Gen. A. C. Wedemeyer)到译员培训班讲话<sup>[9]</sup>。陈诚曾经“集合译员讲话,勉以注意国格及人格”<sup>[10]</sup>。蒋介石也曾亲自到昆明检阅军委会译训班。

国民政府安排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主的专家教授担任教师队伍,对培训的时间、课程、内容等都作了十分详细周到、较为科学的安排,以此保证培训的质量,体现出对培训质量的高度重视。

### 3.1 战地服务团译训班

1941年10月,战地服务团在昆明第一招待所举办了第一期译员训练班,黄仁霖为主任,西南联大教授吴泽霖为实际负责人。到1942年9月,共训六期,毕业译员320多人<sup>[11]</sup>。

译训班授课教师多为西南联大教授。从培训过程来看,培训循序渐进,重点突出,充分考虑到了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译员首先了解美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然后学习国际交流知识、日常会话和军事术语;着重进行口语练习,尽快熟悉“杂牌”英语,改掉学员地方口音<sup>[12]</sup>。同时,还注意到了中西文化知识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开设了《美国史地》、《社交礼节》等课程。培训还包括国际法、儒家社会思想等内容。培训内容一方面增强了学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锻炼了社交能力,便于今后更好地开展翻译服务工作。

1942年8月27日,译训班学员和美国空军官兵联欢,黄仁霖用中文向美国官兵讲孔子的故事,并现场从学员名册中指定学生逐句译成英语。这种即兴的现场口译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训练方式。杨先健回忆,“这件事在我以后的翻译生涯中曾助我解脱困难。”<sup>[13]</sup>

### 3.2 军委会译训班

1943年以后,昆明译员训练班改为军委会外事局主办,地点仍在昆华农校,共举办了11期。11月14日,第一期译员训练班开学,12月25日结业。1944年3月5日,第二期正式开学,报到译员近400人<sup>[14]</sup>。7月26日,第三期结束。11月5日,第四期结业<sup>[15]</sup>。

梅祖彦参加了第一期译训班,据其回忆,译训班班主任黄仁霖,实际由三位联大教授负责,吴泽霖为副主任,樊际昌为教导主任,戴世光主管业务训练,还有一位少校教官管军训及纪律。译训班每天上业务课八小时,内容大致有四类:(1)语言训练,约占40%,口笔译并重。常任教师有Mrs. Baker和华侨王老师,也有不少美军军官前来上课。(2)军事知识,约占35%。主要讲授各种步兵武器的结构和功能,已任职的译员进行教学示范,并前往步兵和炮兵学校观摩整个教学过程。(3)社会知识,约占15%。由西南联大教授和美国人共同讲授中美文化传统、社会习俗和国际形势等。(4)军事训练,约占10%。主要包括简单的步兵操练、早晚集合跑步,没有武器训练<sup>[16]</sup>。

由此可见,军委会译训班在课程设置上已有明显的比例划分,坚持“以军事英语为主的听、讲、读、写突击训练”,显示出组织培训者的精心准备。其次,授课教师对口译的特性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并将其贯穿在教学之中,体现了培训的科学性。因汉英计数方式差异,受训学员须重点练习数字互译。在互译一长串数字时,要很快翻译过来,往往有些困难,多多练习确有必要<sup>[17]</sup>。

## 4 结语

军事译员培训班的组织开办为战争前线输送了亟需的军事翻译人才,军事译员以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实际战争当中,促进了中国军队和盟军的军事联络,增强了中国远征军的战斗力,最终推动战争朝着胜利的方向发展。总之,抗战时期的军事译员培训是个时代产物,历史上鲜有成功经验可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军事译训班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开拓性的创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失为中国系统培养专业高级翻译人才的首次尝试,对当下军事翻译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亦不乏借鉴意义与价值。

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2023年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3J0629)阶段成果之一。

## [参考文献]

- [1] Baker, M. 2006.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 Routledge, p. 5.
- [2] 王士忠. 报告翻译官[J]. 西风, 1945(80): 147.
- [3] 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 学生卷)[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668-669.
- [4] 陈立夫. 陈立夫回忆录: 成败之鉴[M]. 台北: 正中书局, 1995: 291.
- [5] 余斌. 从西南联大学生从军说到昆明现代派[J]. 滇池, 2005(12): 3.
- [6] 云南省档案馆藏. 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班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学员名单, 案卷号: 32-1-300.
- [7] 许渊冲. 追忆逝水年华——从西南联大到巴黎大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6: 113-123.
- [8] 卢国维. 驻印抗日远征军译员生活回忆[J]. 北京观察, 2005(9): 52.
- [9] 译员结业师生欢宴魏德迈、何浩若等均兴奋致词, 愿“中国大道永维世界和平”[N]. 中央日报, 1945年2月2日, 版3.
- [10] 陈诚. 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M]. 台北: 国史馆, 1981: 473.
- [11] 辛学毅. 中国青年在译员训练班[J]. 中国青年, 1944(10): 64.
- [12] 程君礼, 曹庞沛. 抗战时期昆明亲历记[J]. 文史春秋, 2005(1): 33.
- [13] 何宇. 西南联合大学八百学子从军记——1944届从军学生的译员生涯, 收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数据》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09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12-259.
- [14] 滇译员训练班第二期已开学, 报到学员近四百人[N]. 《中央日报》, 1943年3月9日, 版3.
- [15] 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编).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65, 533, 539, 542.
- [16] 梅祖彦. 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1943-1946), 晚年随笔[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52-54.
- [17] 王瑞福. 飞越“驼峰”之后——一个随军译员的报告, 邓贤(编), 在同一面旗帜下[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 187-198.

## 作者简介:

李方华(1981--), 男, 汉族, 山东菏泽人, 硕士研究生,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翻译史、英语教学。